

中国历代诗歌选

(先秦至隋代)

林庚 主编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50125667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代诗歌选.先秦至隋代/林庚主编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302-12300-4

I. 中… II. 林… III. 古典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先秦时代~隋代 IV
. I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9322 号

出 版 者:清华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

<http://www.tup.com.cn>

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

客户服务:010-62776969

责任编辑:马庆洲

装帧设计:宁成春

印 刷 者:

装 订 者:

发 行 者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152×228 印张:21 插页:2 字数:16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302-12300-4/I·69

印 数:1~3000

定 价: 元

导 读

彭庆生

林庚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(上编),既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,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优秀教材。自1961年出版后,深受教师、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,多次重印;1988年,荣获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。

林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,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,在中国文学史、楚辞、唐诗、中国古典小说等诸多领域造诣极深。从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、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开始,到1998年他所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,一直在清华大学、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,教龄长达六十五年。这种集诗人、学者与教师于一身的人生经历,使他在编选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时有如大匠运斤,使这一诗歌选本既富有诗人的灵性,又富有学者的卓识,同时也深具教师的匠心。

一、诗人的灵性

早在1930年,林庚先生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中文系,即以旧体诗词蜚声清华园。例如《谒金门》:“伤离别,此恨悠悠谁说?重岭关山风烈烈,雪晴千里月。望断天涯愁绝,横笛一声吹彻。古寺颓垣红映雪,远灯青未灭。”似乎信口脱出,天然浑成,却情意深远,耐人寻味。然而,第二年,先生却从旧体诗词转向了自由体新诗的创作,并陆续出版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这两部自由体

新诗集。1934年,先生又开始转向格律体新诗的创作,并从此走上了探索新诗格律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。他一面写诗,陆续出版了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等格律体新诗集;一面进行理论研究,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诗格律的论文,后来结集为《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》。2000年,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新创作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,那《序曲》是:

大海是蓝天下无尘的镜子
小河是清风里明月的忧愁
谁能够知道那空间的奥秘
孕育着万象中无尽的风流

深入浅出,自然超妙,寓哲理于形象之中,无论节奏、韵律、语言,都完美地体现了先生七十年来一贯倡导的新诗格律的理想。

在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之际,谢冕先生写过一篇祝寿的妙文,题为《先生本色是诗人》。这七个字,准确地概括了林庚先生的个性特征。的确,从先生的日常言行到授业讲学,从先生的散文到学术论著,莫不焕发着一种源自天性而又久经修炼的诗人气质,加之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与深厚的诗学素养,因此,先生在编选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时,自然以诗人之眼选诗,以诗人之心解诗。这首先就表现在该书的选目上,与唐宋以来许多比较流行的诗歌选本多有不同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云:“人所应有,其不必有;人所应无,己不必无。”本是晋人对当时某种名士风度的赞誉,也是这些名士的一种价值取向;但我想,用来说明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的特色,倒也贴切。

所谓“人所应有,其不必有”,这就是说,历代选家选得较多的作品,本书却选得很少,甚至不选。此中有深意存焉。

唐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卷上云:“士林语曰:‘前有沈、宋,后有钱、郎。’”可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钱起、郎士元在唐代诗坛的影响。因此,后世选家大多对这四位诗人青眼有加。《中兴间气集》

专选唐肃宗、代宗所谓“中兴”时期的诗歌，即以钱起为上卷之首，郎士元为下卷之首，各选其诗十二首。王安石觉得不过瘾，他的《唐百家诗选》竞选录郎士元诗二十一首，钱起诗也选了六首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只选律诗，旨在弘扬“江西诗派”的法门，自然大选而特选所谓“一祖（杜甫）三宗（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）”的作品，但也选了沈诗四首，宋诗十五首，钱诗三首，郎诗五首。似乎“江西诗派”要寻根，也寻到了沈、宋、钱、郎。此后，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选录沈诗十五首，宋诗十二首，钱诗六首，郎诗三首；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选录沈诗十八首，宋诗二十二首，钱诗二十七首，郎诗八首。

然而，本书却只选了沈诗两首，宋、钱诗各一首，至于郎士元，则一首也没有选。这理由是明摆着的。沈、宋的主要贡献在律诗，而五律成熟较早，本书已经选了唐初王绩的《野望》，还选了与沈、宋同时而略早的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、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、杨炯的《从军行》、苏味道的《正月十五夜》、杜审言的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，这些都是初唐五律的杰作，足以代表初唐五律的成就。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角度而言，沈、宋的五律并没有超越上列名篇，因而只选了沈佺期的一首《杂诗》；况且，这首五律之所以能够入选，也并非由于它特别出色，而是其颌联十分精彩：

可怜闺里月，长在汉家营。

《杂诗》所表现的征人思妇之情，本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主题，并不新鲜；但这两句却给人以新鲜的感受，正如林庚先生所说：“这里是飞跃千里还是连成一片呢？其实正是那飞跃千里才见出那心心的相连，也正是那心心相连才有力量飞跃千里。可见若没有感性潜在的交织性，语言上的飞跃就无所凭借，没有飞跃性的语言突破，感性也就无由交织。……总之，一切都统一在新鲜感受的飞跃交织之中。”七律成熟得稍晚一些，在创作年份可考的初唐七

律中,沈佺期的《古意》应是最早而又最出色的一篇,理所当然入选了。宋之问的律诗没有入选,却选了他的《寒食陆浑别业》:

洛阳城里花如雪,陆浑山中今始发。

旦别河桥杨柳风,夕卧伊川桃李月。

伊川桃李正芳新,寒食山中酒复春。

野老不知尧舜力,酣歌一曲太平人。

宋之问原是著名的宫廷诗人,奉和应制,是他的当行本色;但这首写在山中别墅的七古,却散发着一股山野的芬芳,令人耳目一新,在被应制诗压得喘不气来的初唐诗坛,自然弥足珍贵。至于钱起与郎士元,奔走于权贵之门,逞才于华筵之上,其诗也多为流连光景、点缀升平之作。因此,本书只选了钱起的《省试湘灵鼓瑟》。这并非由于它是一首“亿不得一”的试帖诗,而是那末两句写得好:

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。

这可真是神来之笔,以致产生了这两句原是“鬼谣”的传说。其实,这奥妙就在“从听觉飞跃到视觉”,“从‘不见’的沉默中飞跃到‘数峰青’的有所见,而这有所见乃更加深了对于那‘不见’的感受。若再深入下去,还可能有许多言语。如此丰富的感受,顷刻间凝成,仿佛是透明的结晶,使得单线平铺的语言乃焕发出一种立体感”。

所谓“人所应无,己不必无”,这就是说,历代选家很少选录甚至从不选录的佳作,林庚先生却能发掘出来,表现出他对诗歌艺术独有灵犀的神悟与迥异侪辈的审美眼光。这些作品,自能拓宽读者的视野,使之获得新鲜的审美享受。

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云: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。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。”这前两句是好懂的。在中国诗史上,除了屈原和杜甫自己,还有谁能与李白媲美呢?所以说“无敌”、“不群”。

但后两句就不太容易理解了。提起庾信,人们首先想到的,是他“不无危苦之辞,唯以悲哀为主”的《哀江南赋》和同一基调的组诗《拟咏怀》,但这些似乎都很难说得上“清新”。至于鲍照,世人最注重的,是他以反抗门阀制度为中心主题的《拟行路难》等七古歌行,固然慷慨激昂,但“俊逸”似乎又不止是慷慨激昂。那么,杜甫为什么要说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呢?请看本书选注的两首诗。一首是鲍照《代春日行》:

献岁发,吾将行。
春山茂,春日明。
园中鸟,多嘉声。
梅始发,柳始青。
泛舟舫,齐櫂惊。
奏《采菱》,歌《鹿鸣》。
微风起,微波生。
弦亦发,酒亦倾。
入莲池,折桂枝。
芳袖动,芬叶披。
两相思,两不知。

这生机勃勃的春天的赞歌,不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李白的“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”吗?而青春的旋律,正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。另一首是庾信《狭客行》:

狭客重连镳,金鞍被桂条。
细尘障路起,惊花乱眼飘。
酒醺人半醉,汗湿马全骄。
归鞍畏日晚,争路上河桥。

写侠客的豪情,英气逼人。从骆宾王开始,在初盛唐诗人中,任侠之风颇为盛行,而李白尤为突出。他不仅学过剑术,做过侠客,而

且还写过《侠客行》、《少年行》、《结客少年场行》、《君马黄》等游侠诗,甚至说:“儒生不及游侠人,白首下帷复何益!”读者若能认真阅读鲍照《代春日行》与庾信《狭客行》,自当领悟杜甫那名句的内涵。顺便提一下,鲍照《代春日行》虽曾入选沈德潜《古诗源》、王闾运《八代诗选》等选本,但更多的古诗选本,如唐汝询《古诗解》、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、王士禛《古诗选》乃至余冠英先生选注的《汉魏六朝诗选》等等,都没有选录这首诗。至于庾信《狭客行》,在我读过的十多种古诗选本中,尚未见到有人选录。

李白是家喻户晓的大诗人,他的代表作也大多是举世公认的。但林庚先生却独具慧眼,仍能选出古今选家从未选过的好诗来,如《独漉篇》:

独漉水中泥,水浊不见月。
不见月尚可,水深行人没。
越鸟从南来,胡雁亦北度。
我欲弯弓向天射,惜其中道失归路。
落叶别树,飘零随风。
客无所托,悲与此同。
罗帏舒卷,似有人开。
明月直入,无心可猜。
雄剑挂壁,时时龙鸣。
不断犀象,绣涩苔生。
国耻未雪,何由成名?
神鹰梦泽,不顾鸱鸢。
为君一击,鹏搏九天。

林庚先生指出:“从那水中的‘无心’之月,竟唤起了生活中现实的‘行人’之苦的同情,这共鸣是何等的高贵。这是吟风弄月的轻薄之徒所能想象得出来的语言吗?在这里我们真正看见了李白的赤子之心,那是一个天真的,广大的胸怀;在这里我们也认识了什

么叫深入浅出。”袁行霈先生说：“‘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’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，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，非李白写不出的。”又如李白有两首《长相思》，一般唐诗选本多选“长相思，在长安”那首，而本书却选了另一首，这诗中说：

忆君迢迢隔青天，昔时横波目，今作流泪泉。

不信妾肠断，归来取明镜前。

这闺中少妇的相思之苦，竟使得原本秋波横生的美目，变成了一口泉眼，并要求那面镜子等到丈夫归来时为她作证。这种李白式的艺术夸张，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，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合理的”，读者“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，而只感到分外亲切，分外动人”。

杜牧与李商隐都十分推崇李贺，一个为他作序，一个为作传。特别是杜牧《李贺集序》，对李贺诗歌作了崇高而全面的评价。但宋人却似乎只记住了杜牧《序》中的一句“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”，因而说李贺是“鬼才”，说李贺的诗是“鬼仙之词”。这实在是冤枉。李贺虽然失意而不寿，诗中自多悲愤激越的不平之鸣，诗风也有些险怪；但他确是一位旷世的天才，诗中也有一些清新自然的佳作。本书就选注了两首古今唐诗选本都未曾选过的好诗，一首是《蝴蝶飞》：

杨花扑帐春云热，龟甲屏风醉眼缣。

东家蝴蝶西家飞，白骑少年今日归。

另一首是《江楼曲》：

楼前流水江陵道，鲤鱼风起芙蓉老。

晓钗催鬓语南风，抽帆归来一日功。

鼃吟浦口飞梅雨，竿头酒旗换青芒。

萧骚浪白云差池，黄粉油衫寄郎主。

新槽酒声苦无力，南湖一顷菱花白。

眼前便有千里思,小玉开屏见山色。

情致缠绵,清丽鲜活,代表了李贺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只有选出这样的作品,读者才能理解杜牧《李贺集序》所言:“云烟绵联,不足为其态也;水之迢迢,不足为其情也;春之盎盎,不足为其和也;秋之明洁,不足为其格也。”也只有把《蝴蝶飞》、《江楼曲》与本书所选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、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、《致酒行》等作品结合起来阅读,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李贺的诗风。

二、学者的卓识

作为一个学者,最可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思考,勇于创新,坚持真理。这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很难;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要做到不迷信,不随波逐流,不屈从,敢于坚持自己的创见,不说难于登天,却也相差无几。林庚先生就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学者。尽管他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不断地遭到批判,然而,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

1941年,在厦门大学出版的油印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中,林庚先生首倡“少年精神”;此后六十年中,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学术论著,他都一直坚持这一观点。据林先生自己的说明,“少年精神的内涵,就是有朝气有创造性的、蓬勃向上的,即使是忧伤痛苦,也是少年的忧伤痛苦”。1954年,林庚先生的名著《诗人李白》出版;不久,就引来了连篇累牍的批判。这批判的重心就是《诗人李白》所倡导的李白的“布衣感”,即“布衣的平等自由的斗争信念,也就是那时代中解放的情操与高涨的民主的意识形态”,说得更通俗些,“就是不在权贵面前低头,要想有开明的政治,就必须反对权贵”。这些观点,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,挨批判自属在劫难逃。最奇怪的是:1958年1月,为了迎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,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《盛唐气象》,初衷是“预祝北大能产生一种

盛唐时代一样恢宏博大的文化,中国的新文化能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”。这不正是百年来所有北大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吗?不也正是今日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心愿吗?而且,林先生的论文写得明明白白:“蓬勃的朝气,青春的旋律,这就是‘盛唐气象’与‘盛唐之音’的本质。”这不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令人神往的境界吗?然而,在1958年夏的“教育革命”中,这“盛唐气象”,连同“少年精神”与“布衣感”,却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”,横遭批判。对此,林庚先生泰然处之,一面在课堂上继续神采飞扬地大讲“盛唐气象”、“少年精神”与“布衣感”,一面又连续发表了《谈〈古风〉春种一粒粟》、《陈子昂与建安风骨——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》、《答读者问》等一系列论文,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。用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,这叫做“你批你的,我写我的”。历史是公正的,时间是唯一的试金石,正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《诗人李白》之《新版说明》所说: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李白的论著,一应基本问题,都已导源于这部篇幅不大却如此沉甸甸的、历劫不灭的著作。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,今天当我们重新捧读《诗人李白》时,仍会感到一种先期透视的时代的青春的芳馥,一种涌动的生命的活力而深受启迪。”林庚先生的其它重要论著,也是如此。

林庚先生的学术思想,也体现在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中。本书收录的范围是从西周到五代,时间跨度约两千年,选诗总量为550首;而文学史所讲的盛唐,从开元元年(713)算起,到杜甫去世,满打满算也不过58年,但所选诗歌却多达151首。况且,林庚先生讲“少年精神”,历来是从建安时代讲起,他认为曹植的《野田黄雀行》、《白马篇》、《名都篇》等诗,都富有“少年精神”,并一贯主张:盛唐气象是建安风骨进一步的发展,陈子昂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之间的桥梁。如果把入选的建安诗歌23首、陈子昂诗9首计算在内,再加上颇有盛唐馥韵的韩翃、卢纶、李益的作品,则体现盛

唐气象及其相关的诗歌多达 191 首,占全书所选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强。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,正表明林庚先生对盛唐气象情有独钟。更意味的是,本书所选最后一首唐诗乃韦庄《焦崖阁》:

李白曾歌蜀道难,长闻白日上青天。

今朝夜过焦崖阁,始信星河在马前。

1990 年秋,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拟出版一套《名家推荐丛书》,约请林庚先生推荐唐诗,先生编选的《唐诗》,也是以这首《焦崖阁》殿后。这深意,是不是让读者读到他所选的最后一首唐诗时,仍能回味盛唐气象,神往那盛唐时代的辉煌呢?

在上世纪末的一次访谈中,林庚先生强调:“我认为王维的真正价值是他的少年精神,是他早期的《少年行》,是‘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’这样一类早期的作品。虽然他的边塞诗不多,但他年轻时的作品才是他的真正代表作。‘唯有相思似春色,江南江北送春归’,这才是真正代表唐诗的。……《辋川》诗也不是说不是好诗,但不是最可宝贵的东西。”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,从 1941 年的油印本《中国文学史》,到近年对老门生的教诲,向来如此。既不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“少年精神”的批判而动摇,也不因八十年代后掀起的“山水诗热”而改变。本书也贯彻了这一学术观点,共选注王维诗二十首,其中十七首是富有少年精神的早期作品,如《少年行》、《陇西行》、《夷门歌》、《陇头吟》、《老将行》、《不遇咏》、《终南山》、《观猎》、《汉江临眺》、《使至塞上》、《相思》、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、《送沈子福归江东》等,而王维后期的山水诗只选了《鹿柴》、《鸟鸣涧》、《山居秋鸣》等三首。

李白的“布衣感”,在本书中也显得很突出,如《将进酒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、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、《扶风豪士歌》、《古风·大车扬飞尘》等,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“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览明月”,是布衣的豪情;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

海”，是布衣的自信；“作人不倚将军势，饮酒岂顾尚书期”，是布衣的骄傲；“钟鼓饔玉不足贵”，“董龙更是何鸡狗”，是布衣对权贵的蔑视；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“严陵高揖汉天子，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”，是布衣反抗权贵、藐视王权的歌声，是布衣追求自由平等的呐喊，是那民主意识高涨的时代的最强音。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，都出自本书所选李白的名作中。

本书的注解，是由林门高足吴小如、陈贻焮、袁行霈、倪其心等先生担任的。这四位先生都是学识渊博、治学谨严的著名学者，担任注解工作，可谓游刃有余。作为主编，林庚先生既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，又始终严格把关，正如本书《前言》所说：“从我们编写的过程说，凡有疑难，或历来聚说纷纭，或从来并无注解，或不同于传统成说之处，都经过再三讨论，才作出解释。”因此，无论作家小传，或诗歌题解与注释，都严谨准确，简明扼要，言必有据，学殖深厚；同时，也融入了林庚先生的许多创见。

林庚先生是“五四”以来最负盛名的楚辞专家之一，他的极富开创性的楚辞研究成果，也体现在本书中。如《离骚》注^①：“这篇长诗大约成于楚怀王十六年（公元前三一三年），是屈原因被上官大夫谗毁而离去郢都时所作。‘离骚’，等于说‘牢骚’，‘离’、‘牢’是双声字。”根据林先生对屈原生年的考证，则《离骚》当作于屈原二十三岁时，而学术界多谓《离骚》是屈原晚年的作品；他对“离骚”的解释，既不同于传统的说法，也迥异于现代学者的见解，而自成一家。又如《招魂》注^①：“本篇是屈原为三闾大夫时所作，是描写为阵亡的贵族武臣们举行葬礼的作品，性质与《国殇》相类似而所祭对象的身份各自不同。”这短短三句话，概括了先生《招魂解》与《招魂地理解》这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，对《招魂》的主旨作出了全新的阐释。又如楚辞的断句，许多学者都以“兮”字为依据；但林庚先生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，发现“兮”字“在《楚辞》里并不是唯一断句的凭借”，而是“半句上的一逗”。这一发现的合乎

逻辑的发展,便是林先生后来所揭示的“半逗律”这一中国诗行的基本规律。因此,本书所录屈原作品的断句,与众不同,“兮”字后面不用逗号。如《离骚》:

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,
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。

《哀郢》:

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,
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鼃吾以行。

《涉江》:

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,
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。

并且,林庚先生还从楚辞的断句,进而发现了《涉江》的错简,指出《涉江》的第22句“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”,本来应该在第9句“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”之前,由于错简,将“接舆”句后置,致使这两句都成了单句,与上下文都不叶韵,文义也不连贯。对此,《涉江》注⑨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。

在其他作品的注解中,也有不少林庚先生的创见。例如《木兰诗》:

朝辞爷娘去,暮宿黄河边。
不闻爷娘唤女声,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
朝辞黄河去,暮宿黑山头。
不闻爷娘唤女声,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。

过去一般的解释,多谓“黑山”即“杀虎山”,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;“燕山”指“燕然山”,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。问题在于:木兰才到了“杀虎山”,怎能听到近千公里外“燕然山”上的胡骑声呢?为此,林庚先生于1961年写了《〈木兰辞〉中

的燕山和黑山》一文,以大量可信的史料考证出“燕山”就是蓟北至山海关的燕山,“黑山”就是北京市昌平的天寿山。同年12月13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丁力《解决了〈木兰辞〉的疑难问题》一文,称许林先生的考据结论“是一个发现,很重要,它解决了一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。考据材料,也确凿可信。……不仅关系到《木兰辞》的艺术性上的解释问题,而且关系到思想性”。本书吸纳了林先生的这一创见,将一篇四五千字的考据文章,浓缩成了不到三十个字的注释。又如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:

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旧注多谓巴峡即长江三峡之巴峡,一名西陵峡。但当时杜甫身居梓州,要回洛阳,自然沿涪江南下,入长江,出三峡;而西陵峡在巫峡之东,怎么会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呢?这不正好与杜甫回洛阳的路线背道而驰吗?在林庚先生的指导下,本书一反旧注,曰:“巴峡,四川东北部巴江中的峡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五引《三巴记》曰:‘阆、白二水合流,自汉中至始宁城下,入武陵,曲折三曲,有如巴字,亦曰巴江。经峻峡中,谓之巴峡。’”这样一注,诗意就豁然贯通了。

三、教师的匠心

本书《前言》说:“本书是为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诗歌选课程编写的教科书。”作为教科书,当然必须保证其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完整性。本书在这方面力求尽善尽美,颇具匠心。这首先就体现在选目上,思虑缜密,应有尽有。既充分反映了中国诗歌的源流与发展的不同阶段,又突出了重点;既充分反映了各种诗体的形成与嬗变,又兼顾了各种不同的流派与风格。

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云:“自汉至魏,四百余年,辞人才子,……莫不同祖《风》《骚》。”

钟嵘《诗品》论述某一诗人,往往强调其渊源有自,这些不同的渊源,归根到底,无非两类:一是“其源出于《国风》(或《小雅》)”,一是“其源出于《楚辞》”。可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实为中国诗歌的不祧之祖。因此,本书选注了《诗经》38首,其中《国风》30首、《小雅》5首、《大雅》2首、《周颂》1首。可以说,《诗经》的精华,尽在此中。屈原的作品,本书收录了《离骚》,《九歌》之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少司命》、《东君》、《河伯》、《山鬼》、《国殇》,《九章》之《哀郢》、《涉江》以及《招魂》,共11首。正如林庚先生自己所说:“在这部诗歌选中,屈原的代表作几乎都选注了,只有《天问》由于注释上的困难,没有敢碰它。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!。直到二十年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扛鼎之作《天问论笺》,才了却这一心愿。《风》《骚》之后,从荆轲的《易水歌》到李后主的词,历代名家名作,本书均有选录,既照顾全面,又突出重点,凡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各时期的重要诗人,入选的作品都比较多,读者只须浏览本书的目次,就能略知中国诗歌发展的轨迹。

以诗体而言,从西周到唐五代曾先后出现的四言古诗、骚体、乐府体、五言古诗、三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五言排律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、词等各种诗体,本书皆囊括无遗,唯六言诗与七言排律没有入选。原因很清楚:六言诗句是由三个双音节构成的,没有五七言诗句的“三字尾”,节奏单调而呆板,既不容易写好,更不容易流传,因此,在中国诗史上,它本来就不发达,佳作尤为难求,历来的诗歌选本也罕见选录六言诗者。排律又称长律,多用于奉和应制、科举考试、陈情干谒、送别应酬,鲜有情真意切的作品。其体制短则六韵(12句),多则百十韵,句句要符合平仄律,而且,除首尾两联外,联联要对仗。五言排律已很难驾驭,七言排律就更难写了。诚如明人吴讷《文章辨体》所说:“唐初五言排律虽多,然往往不纯,至中唐始盛。若七言,则作者绝少矣。大抵排律若句炼字锻,工巧易能;唯抒情陈意,全篇贯彻,而

不失伦次者为难。”因此,后世唐诗选本,也极少选录七言排律。如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选录唐诗 1920 首,七言排律只选了两首,夹在卷十八“五言长律”中,如果不费劲找,还真不容易发现。高棅《唐诗品汇》连同其《拾遗》,共选唐诗多达 6723 首,大概是选诗最多且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了,也仅选七言排律 4 首,附于卷九〇“七言律诗”之后。可见,作为教科书,没有必要选录六言诗与七言长律,只须教师讲课时略加提示即可。

本书原是为中国诗歌选这一课程编写的教科书,当然也可以用作中国诗歌史、中国文学史的参考书;但无论那门课,都不可能在课堂上讲解完本书所选注的 550 首诗。我想,编者的意图,大概有三:一是给主讲教师提供自主选择的充分余地,二是为热爱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学生提供课外自学的读本,三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全面体现中国古典诗歌光辉成就的选本。这种对教师的尊重和处处为学生、读者着想的苦心,也体现在题解与注释上。

尽管本书的题解与注释都力求完善,但其《前言》仍特意说明:“主讲教师还可以按自己认为更好的意见讲解。”而且,往往编者本有独到精辟的见解,但在注释中也只是引而不发,留待读者自己去领悟,去判断。例如王之涣《凉州词》:

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
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首句一作“黄沙直上白云间”,一作“黄河直上白云间”。有些学者认定唐代的凉州城(今甘肃武威市)离黄河甚远,因此,“黄河”应作“黄沙”。但大多数读者还是选择了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,这是什么缘故呢?为此,林庚先生写了两篇文章,一是《说凉州》,指出“凉州古来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区,并不是单指凉州城说的(当然凉州城也无妨称凉州),而且最早的凉州城也不在武威。两汉以来凉州本指当时陇右一带,……当时凉州刺史治陇城(今甘肃秦安县东北),在黄河以东,所以凉州原来就是横跨黄河的。……凉州